

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丛书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主编
北京大学



生态移民政策 与地方政府实践

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

谢元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丛书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主编
北京大学

生态移民政策 与地方政府实践

以教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

谢元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 / 谢元媛 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

(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丛书)

ISBN 978-7-301-09931-5

I. 生… II. 谢… III. 移民—政策—研究—中国 IV.D6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5660 号

书 名：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

著作责任者：谢元媛 著

责任编辑：丁 超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09931-5/C·057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pw@pup.pku.edu.cn

封面设计：点石坊

平面设计：点石坊

印制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5 印张 2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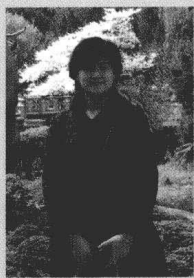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谢元媛，1977年生于山东东营，2005年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人类学博士学位，挪威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文化研究与东方语系（IKOS）访问学者，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RIO）项目合作研究员。现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工作。

鸣谢利丰社会政策研究基金的大力支持。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阔别五年
不长也不短的时间
思念如歌
如泣亦如诉
把我拉回记忆的深渊

曾经想要放弃
这是自私的一闪念
而你一直默默的坚持
让我无比汗颜
同时促我加鞭

累积的惭愧中
但求不辜负你的期望
眼前依稀闪烁着
熟悉又遥远的面容
又一次不禁泪流满面……

总 序

王思斌 阮曾媛琪

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时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 9.9% 的速度增长，不但创造了令全球瞩目的“发展的奇迹”，也使得中国跻身世界三大经济体之列，实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世纪崛起。

建立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是改革采用的主要发展模式。为此，国家一方面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以前的集体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在城市和加工工业区推行资本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以取代原来的国有企业主导的计划经济。针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分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普遍获得了明显改善。我们今天为中国崛起，为“发展奇迹”欢呼，然而，我们同时也绝不能忽视已经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城市下岗失业工人问题、环境生态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及性别平等问题等。生活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规模在扩展，从农民、农民工扩展到城市下岗失业工人，近年来又有被称作“蚁族”的工资微薄、居住窘迫的大学生群体被卷了进来。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小部分垄断大量生产资料，占有大量物质财富的人群，他们率先暴富，却没有带动广大劳动者共同富裕，而且在事实上挤压其他劳动者的生存空间，成为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严重障碍。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正成为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清醒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1364 页】，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他的睿智之言。

更进一步思考，以上提到的问题与其说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毋宁说就是“发展”本身的问题，是我们长久以来对“发展”的片面理解造成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发展”被等同于简单的经济数据增长，尤其是总量数据上的经济增长，而很少顾及“发展”是否更加均衡持久，是否惠及更多人群，是否提升所有人的生活处境。如果这样片面理解“发展的奇迹”，那我们如何去看待一部分弱势地区、弱势人群“没有发展”的事实？中国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但是所有人群分食蛋糕的机会却并不均等，弱势群体通过“涓滴效应”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要纠正改革中出现的这些偏差，就必须正视“发展”本身的问题，改变先前对“发展”的片面理解，树立并实践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弱势群体缺乏社会保障等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

本套丛书记录了中国发展大背景下各种人群日常鲜活的生活经验，丛书的作者们希望藉这些人群的遭遇帮助我们重新反思发展本身存在的问题，打开发展的丰富可能性，积极推动一种更加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

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5 届毕业生谢元媛博士邀我为她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写序，我感到非常高兴。

作为北京大学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研究课题的发起人，我曾先期到过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也就是后来谢博士进行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地方。提出这个课题，是源于我出差时的一个偶然机会，我亲眼见到了刚刚进行完生态移民的当地人的生活状态。那里的生活条件艰苦落后，新建的平房潮湿寒凉，室内的厕所还不能使用，当地人的情绪与我们一般观念中的“乔迁之喜”有很大反差。结合媒体的报道与自己亲身的感受，我心头总是缠绕着一些难以解开的谜团。于是，出差回来，我立即找到了北大社科部主管文科科研的萧群副部长、社会学系的高丙中教授和历史学系的徐凯教授，提出关于当地的研究计划。丙中是我在美国夏威夷访学时的同学，他跟我讲述过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相信以跨文化研究为专长的人类学学者可以给我们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另外，当时隐约感觉到，当地人对历史的表述有些纷乱，以致对现实问题的认同有些困难，所以也希望历史学学者能够对当地的历史给予关注，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我建议他们先抓紧时间去做实地调查。后来，听说老师们由于脱不开手头已有的工作，就派了博士生去做调查。当我得知是一个女博士生独自去做田野工作的时候，不禁担心，甚至嗔怪丙中：“那个地方你又不是没去过，怎么不派个男生呢？”

因为我们几个去过的老师对当地与北京生活环境的天壤之别非常清楚、很有共识，所以都非常赞赏谢博士独立进行长期田野工作的勇气和毅力。终于，她的表现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了这一课题艰巨的调查任

务。后来，我了解到，谢博士在那里很受欢迎，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还住过山林里条件异常艰苦的猎民帐篷，当地人对她的评价很好，说她非常能吃苦。我为我们的学生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积极乐观、不怕吃苦的精神而感动。

谢博士的这本论文，材料的叙述真实可感，文笔生动细腻，很有可读性。我猜，即使非人类学专业的读者，一旦开卷，也会很容易产生阅读的兴趣。任何一项研究，都不只在书写研究对象，同时也在表达着研究者自身。看罢这本论文，不难产生这样的印象，作者是一位拥有社会关怀之爱心同时兼具理性与反思智慧的学者。

通过这篇博士论文，我想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至少有三点值得提倡。

第一，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经验。任何科学的发现、知识的创新、社会问题的解决、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探索，都不只是靠书斋里的思考就可以总结出来的，更为基础的首要工作是掌握关于社会现实的第一手经验材料。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当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研究态度，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第一线，去发现他们生活中的难题。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知识，是原创的，也是有用的。我联想到一个南极探险的事例，设立在南极南纬 90° 的科学实验站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这是为了纪念人类历史上最早到达南极点的两名科学探险家——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国人斯科特而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阿蒙森比斯科特提早了近五个星期到达南极并且胜利而归，而斯科特等五名冲击南极的英雄，因为南极寒冷天气的突然提前到来，饥寒交迫，体力不支，在返回的路上与严寒搏斗了两个多月，最后长眠在茫茫的冰雪之中。研究南极探险史的科学家经过具体分析后指出，阿蒙森的胜利和斯科特的失败，并非在于两者的计划周密与否，而在于前者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制订计划，后者则凭推理设想来制订计划。提到这个事例，是为了说明来自真实的社会经验的知识非常有用，而且可能缺乏及时的总结与分享。所以想提醒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日新月异的变化，到人民的生活实践中去观察、体验，从而获取新知。这种知识不是在书斋里幻想出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出来的。在如今学术界感叹抄袭多而原创少的时候，我们不妨多关注一下实际生活中的经验研究。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为获取真实的经验资料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学术途径，应该成为一切

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从当下的实践经验中产生的知识，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吃苦与专注的科研精神。一个女生，告别大城市的优越生活，独自一人前往陌生而偏远的山区进行田野研究，冬天要忍受冰天雪地的刺骨严寒，夏天要忍受各种蚊虫的叮咬、吸血，还要冒着感染森林脑炎、结核病等传染病的风险，在物质条件落后的小乡村呆了长达一年之久，如果没有专注于学术的信念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这是难以做到的。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如果缺乏全神贯注的思考与研究，对于表象之下的内在本质联系，也是难以有所发现的。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为了获取真实的经验材料往往要经受比常人更多的身体上的劳苦。我们知道，欧美一些动植物学家深入非洲等自然环境凶险的地区进行科考的经历，都难免遭遇意外伤害，甚至牺牲。为我们熟知的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曾参加过英国派遣的环球航行，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体的辛劳和损伤都是难免的。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可能的危险，研究者们都是提前知道的，但是在获取真知的路上，总有敢于披荆斩棘、用鲜血和汗水换取智慧果实的勇者继往开来。是研究者炽热的学术情怀和追求真知的坚定信念，才能支撑着他们并不魁伟的身躯在危险、艰难的环境中坚持走下去。我联想到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曾经为做劳工问题研究而进行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一个瘦弱的女博士生到深圳一家港资工厂打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打工妹”，跟工厂其他打工妹一起同吃同住，8个打工妹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宿舍里，挤在水房里洗漱……每天进行十一二个小时的劳动；在这种经历的基础上，她借由一个社会学家的训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丰富、更深刻的生活图景，替中国打工妹群体发出了“失语者的呼声”。这些科学研究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新鲜的、富有价值的知识。当这些知识以影像资料或者书籍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它们。而科学研究者本人为把这些知识发掘、呈现出来，其中付出的艰辛与努力我们可想而知！他们的这种付出和吃苦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享用他们知识成果的人感激和敬佩。

第三，自我反思、解放思想的科学研究精神。科学研究工作者不仅应当掌握既有书本中的原理，更要善于用科学的研究态度对待书本中的

原理。对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不应教条式的，而应辩证的、实事求是的，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全方位地反思理论与实践，从而改进实践，提升理论。科学研究工作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反思，不断突破客观上的自我局限。是敢于打破旧有的思维、直面现实和矛盾，还是固步自封、畏首畏尾，考验着科研工作者的良知和胆识。只有解放思想、善于反思的学者，才能不断冲破既有知识体系的局限，善于从实践经验中发现既有政策或者理论的不切实际之处，从而为下一步更好的实践提供可资参考的理论观点。比如，谢博士在田野工作中，冲破舆论片面的宣传，深入当地人生活的实践中，敏锐地察觉到当地人们不同种类的抱怨以及对民族身份认同的混乱，通过具有反思意识的视角转换，揭示出人们之间种种矛盾冲突的文化根源，以及政府政策在实践中落实的脱节问题。她的一些研究发现对我们重新认识现实中的实践、继而改善实践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她发现猎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这对地方政府用以一概全的方式制定政策来说，就是个非常及时的提醒。她的这项研究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我希望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涌现出更多务实的科研工作者，不仅具有良好的学理基础，而且具有社会关怀的问题意识，秉承社会公正的良心，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和不怕吃苦的精神深入基层，去感受、去发现那些容易为一般人所忽略的事实。这些通过研究而呈现出来的“事实”，拓展了人们的认识，丰富了人们的体验，增进了人们彼此的理解，消除了误解，这就达成了知识的创新。这种知识创新的过程是我们不断解放思想、进行反思的一个成果，也是我们不断走出自我偏见的推动力，促使我们用更包容、更虚怀若谷的心态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这样就为实现人们的和谐相处创造了更多的可能。

郝平

2009年9月12日于北京

前 言

每个个体都在关注自身的发展，作为独立的国家，也在关注自身的发展。不论是谁，都会关心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发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不同的群体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困境或者机遇。我们该如何看待发展中的问题？本研究想通过一个少数民族的发展案例进行以小见大的反思和推论，为国家发展观念在实践中的体现提供一个民族志的解读。从国家意义的层面，通过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对比的视角，我们也许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自身，从而自主地寻找到走出发展困境的办法，抓住发展中的机遇。

就具体的边缘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何发展，也是一个长期以来为世界大国的学术界和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从历史到现实一直经历着多民族演化的世界大国之一，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会对本国区域发展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更会对世界知识生产领域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

发展的道路在哪里？当人们普遍着眼于求索未来之时，恐怕忽略了认清眼下的现状可能更加重要。而现状是否认得清，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尽量摆脱成见，做到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去看问题，从而达至对问题的了解更加全面，理解更加深入。从学者对社会发展所可能做出贡献的角度说，也许“发展”不是去改变他者的立竿见影的行动，而是通过自身知识的拓展、认识的深入和觉悟的提高，表达出易为掌控实践局面的决策者忽略的声音，从而为各方面群体采取恰当的实践行动提供必要的思想认识条件。本研究在长期实地田野工作获取第一手真实材料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边缘族群的、发展的方向建立反思视角，试图对曾经引起多方面关注的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事件有一个更为周详的认识，

由此对发展的路径提供现实的依据和理论参考。

2003年9月至2004年10月，我在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于2005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关注这一选题，源自这样一段渊源。2003年暑假，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郝平教授出差途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新址，发现了当地新发生的改变与当地人的情绪之间出现了发人深省的反差。出于学术的敏感性，郝平教授联系了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的高丙中教授，提供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我得知以后，对当地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关注媒体报道，着手准备赴那里进行田野考察，并得到来自北大校长课题的经费支持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的热情接洽。

论文出版得益于另外一个机会。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我受中国政府与挪威政府互换奖学金项目资助，在挪威奥斯陆大学文化研究与东方语系（IKOS）作访问学者。在此期间，与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进行学术交流时，发现了相似的研究经历和旨趣。他们对我的博士论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法国、瑞典、美国的学者也通过电子邮件索要我的论文。在一次学术讲座上，我有幸结识了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她正在主持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丛书的编纂，与她进行了深入沟通之后，她支持我将书在国内出版。

将论文出版，还出自一份发自内心的感动与惭愧。2009年3月底至4月初，我受邀参加在挪威北部的萨米地区凯图凯诺（Kautokeino）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驯鹿牧养者大会（4th World Reindeer Herders Congress），在那里，我遇到了来自中国敖鲁古雅的、我熟识的鄂温克人的代表团。当他们告诉我，曾经让我在她家住过的额沃（当地鄂温克话“老大娘”）还时常念叨我，说盼着我带孩子回去看望她的时候，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知道，敖鲁古雅，留给我的不只是生命旅程中的一段经历，还有我对那里人们的一份牵挂和愧疚。

带着这份愧疚，我开始重新整理当年的博士论文。为什么政府好心安排的生态移民政策在当时实施之后，引起了人们诸多的抱怨？如何改变那种不太积极的生活状态？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知道，力图保持冷静的研究态度也不能遮蔽我自身视角的局限，我只希望以自己出版论

文的行动让期待的人们感到一丝欣慰。但是，我也深知，所有的感受当落入纸面的时候，会多少有点遗憾。为了避免给善良的人们带来本不应有的伤害，我将文中的真实人名全部隐掉，以化名出现。有关政府工作人员的职务、身份也请勿对号入座，因为几年来的变化已经面目全非。何况，我亲身的经历感受是，当年我所接触过的每个人，包括百姓和政府官员，内心都充满温情与善意，如果彼此之间发生了任何的矛盾冲突，只是由于认识的角度问题，或者角色扮演的问题，很多时候甚至采取了一些自己事后追悔莫及的做法。随着成长，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们的艰难和每个人都具有的善良本性。只是，习惯的偏见容易妨碍我们对别人的理解，欠缺的交流容易阻滞我们心灵的相通。

所有的一切都在改变，唯有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没有变。感谢我所遇到的人们给予我的宝贵人生经历，让我也有机会去感悟幸福的真谛。

当我听说今天当地人的生活态度已经渐渐恢复平和的时候，我想也许到了各方面都能冷静地回顾过去那段历史的时候。这时，那些希望阅读我文字的读者们应该会给予我更中肯的意见吧。

谢元媛

2009年9月3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005
- 第二节 研究思路 /010
- 第三节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问题回顾 /012
 - 一、以使鹿族群为对象的研究文献 /012
 - 二、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反思 /019
 - 三、反思人类学与民族志书写 /025
 - 四、概念框架和论文安排 /028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033
 - 一、方法论与民族志文本写作 /033
 - 二、具体方法 /036

第二章 田野经历

- 第一节 初入敖乡 /038
- 第二节 猎民点的“原始”生活 /053
 - 一、走过四季 /053
 - 二、初住“大点儿” /058
 - 三、老猎民的森林情结 /060
 - 四、再住“大点儿” /066
- 第三节 猎民点上的困惑 /072

第三章 敖乡猎民生态移民的背景材料

- 第一节 敖乡鄂温克猎民的亲属关系 /080
- 第二节 使鹿鄂温克的历史特征 /083
 - 一、族称族源 /084
 - 二、人口与生存环境 /085